

對金融中心的遺產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在 1525 年的大教堂（Grossmünster）里尋找閱兵廣場（Paradeplatz），未免犯了時代錯置的毛病。蘇黎世宗教改革是一場宗教運動，其領導者若發現自己的事業與私人財富管理聯繫在一起，想必會感到驚訝。然而，一個金融中心也由各種制度、習慣和聲譽構成，正是它們使一個地方值得在那裡存款、放貸和投資的人信賴。Zwingli 所奠定的體制中，有五個要素促成了蘇黎世的這種環境。

第一是由市民控制教會的模式。蘇黎世宗教改革確認，市議會是該市領地內一切事務（包括宗教）的主權機關。市議會通過公開程序、辯論會、條例和法院行使這一權力。市民權力成為秩序、道德和財產的保障者。在後來的幾個世紀里，這一傳統造就了一個在某些方面具有干預性——監督私人行為和商業——而在另一些方面又十分可靠——保護財產、執行合同——的國家。現代瑞士把對私有財產的有力法律保護與對金融活動的嚴密公共監督結合在一起，這一結合有多種來源，Zwingli 式的市民權威與道德權威的融合便是其中之一。

第二是市民紀律。婚姻法庭、道德訓令和宗教會議造就了一種文化：個人的行為，包括其經濟行為，是公共關切的事項。交易中的誠實、義務的履行和不事炫耀，由公共機構強制實施，併為一

對金融中心的遺產

代又一代的市民所內化。蘇黎世商人和銀行家後來在海外享有的穩重可靠的聲譽，其道德根基就在於這種紀律，儘管其商業價值是在這種紀律本身早已鬆弛之後才被發現的。

第三是教育。先知學院以及由教會財產資助的學校，造就了識字的、在上層中更是有學問的人口。Carolinum 培養牧師，也培養商人和官宦家族的子弟。捐贈財富與公共教育之間的聯繫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當時大教堂教士團的資產為大學的創立作出了貢獻——並延續至今：蘇黎世的各所大學和理工學院為金融中心輸送專業人才。

第四是印刷。Froschauer 印刷所使蘇黎世成為印刷知識的生產者和出口者，併為該市留下了一個持久的出版、印刷以及後來的防偽印刷產業。從 Froschauer 到 Orell Füssli 的傳承鏈條，把 1531 年的聖經與現代有價證件的印製聯繫在一起。

第五是對以金錢收買政治影響的外國資金的警惕。蘇黎世拒絕 1521 年的法國同盟，禁止外國年金，並處決了一名因收受年金而獲罪的市議員，由此確立了一種對外國向公職人員付款的不信任傳統。這一傳統並非連續不斷，因為蘇黎世於 1614 年加入了法國同盟，其精英後來也像其他人一樣從外國服役和對外貿易中獲利。但它為該市提供了一套關於公共廉潔的話語——公職人員收受外國金錢即是一種腐敗——這預示了現代對賄賂、利益衝突以及外國對本國政治影響的關切。今天，一位就瑞士關於賄賂外國公職人員、制裁或政治公眾人物的規則提供諮詢的律師，所處的道德視野是 Zwingli 會認得出來的。

與日內瓦的比較將在 B.IV 章中展開，但在一個方面已經頗具啟發。在日內瓦，宗教改革與一個龐大難民群體的到來相關聯，他們帶來了資本、商業關係和世界主義的眼光；同時，它也與一個主張在一定程度上獨立於官府的教會相關聯。在蘇黎世，宗教改革是本土精英通過自己的市議會完成的事業。在這裡，教會始終從屬於國家，而對外國難民的開放則來得更晚、更謹慎。因此，這兩座城市以不同的市民控制與國際開放的組合進入近代早期，這些差異至今仍可在它們金融中心的特質中感受到。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狀況。

網上版本：hk.helveticaregister.com/zurich-legacy-for-the-financial-centre-2